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七次全体会议

1998年9月21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佩蒂先生.....(乌拉圭)

嗣后: 巴莱斯特拉先生(副主席).....(圣马力诺)

上午10时20分开会

议程项目10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秘书长提出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A/53/1)

主席(以西班牙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根据在其1998年9月1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首先审议题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的议程项目10,以听取秘书长对他的年度报告的简短介绍。

我请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和荣幸地欢迎你们所有人参加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我认为,本届会议可以成为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和向前看的会议。确实,它能够为本组织,甚至为世界开辟新的前景,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我们今后的挑战。

在我一年前在这个讲台上对你们讲话时,我的重点是联合国本身的改革。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改革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缺少的。

今天,我可以满意地说,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与一年之前相比,联合国大家庭已开始以更加一致的目的和更加协调的努力行事。就秘书处和它与各种方案和基金的关系而言情况特别如此。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满足于现有成绩。改革是一个不断的进程,我将继续努力制订改进我们的工作的方法。在本届会议期间,我希望,作为会员国的你们将通过采取进一步的

措施来改进或修订本组织那些只有你们有权力改变的方面,以便推进这个进程。

但是,出色工作的最大障碍可能是使我们的工作受到限制的缺乏资金情况。财政紧缩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点:它有助于使我们更加注意少花钱多办事。但是,没有钱就办不了事。财政紧缩是一回事,吃不饱的食物则是另一回事。

我再次呼吁那几个严重拖欠会费的会员国学习其他会员国所树立的良好榜样。除了全部和及时地交纳应付会费以外,没有其他的替代办法。

改革逐渐使我们有一个更有效力的联合国,即一个能够履行会员国交给它的任务的联合国。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并制定应付这些挑战的适当办法。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的创始人有机会和义务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建立本组织以使后代不再重复他们所经历过的痛苦。今天,我们也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任务甚至比我们的创始人的任务更加困难。他们可以从头做起,而我们则必须遵守已经确立的规则并克服长期形成的思想习惯。他们面临巨大的但性质明确的世界大战挑战,而我们则必须对付政治方面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以及对付非常难以捉摸的经济变化力量。

但是,日历的偶然因素我们提供了一个能使我们集

98-85827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中注意力的准确而戏剧性的最后期限:第三个千年的开始。你们已经同意将2000年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会议命名为千年会议。我已经提议在那一届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一份报告,在本组织进入一个新时代之际为它概要规定一套可以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体制方法。

在“千年大会”来临之前正好还有两年。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两年时间仔细思考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不会把《宪章》撕掉并写一部新宪章。我们也不会制定一副乌托邦蓝图。我们必须做的是选出一些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并为自己制定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精确和可实现方案。

我怀疑,该方案的许多甚至所有内容都将被纳入一个已成为我们时代口号的单一类目:全球化。

我认为,总而言之,从长期看,全球化将具有积极意义。它使得各国人民更密切地团结起来,并给我们许多人提供我们的祖父母甚至做梦都不会想到的选择。它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生产,并至少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改善生活质量。

但不幸的是,这些好处远远没有被所有人平等地感受到。对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来说,长期积极变革简直过于遥远而毫无意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仍生活在全球经济的边缘。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正在经历全球化,但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机会,而是把它视为混乱或破坏势力,视为对其生活物质水平或传统生活方式的攻击。感到这样受排挤的人越来越多。

亚洲的沦落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破坏性社会后果。一些经济最成功的国家已陷入衰退,其速度使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震惊。

同往常一样,最易受害群体所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那些其经济刚刚蹒跚踏上复兴道路的国家就是现在陷入最大危险之中的国家。危机现已蔓延到俄罗斯。甚至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也无法不受影响。克林顿总统最近已承认这场野火甚至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构成威胁。

我们必须共同找出答案,但谁应坐在桌旁?7个主要工业化大国可以或者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场危机也不能仅仅靠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家们解决,虽然他们的贡献亦不可少。我无意贬低他们聚会一堂的机构,比如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我们在华盛顿敬爱的姐妹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正如在座的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我曾努力促使联合国和这些机构建立更密切联系,我要高兴地表明,它们都作出非常积极的响应。它们希望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也必须准备同它们一起工作。国际系统各方都必须团结起来,找出解决这场真正全球性危机的全球办法。

因为这场危机提出的问题不仅是财政或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或政治问题,就此而言:它们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必须在所有这些方面对其加以处理。必须在地方和全球两级对付它们。因此,我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这个出类拔萃的全球机构——负有无法逃避的义务,必须作出回应。因此,我期望联合国参加就新世界“金融结构”,例如,克林顿总统建议的方案进行讨论。

技术和财政战略当然需要。但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战略得以实施的政治框架。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迄今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国家的利益不被遗忘。我们的特殊责任是把发展重新置于全球经济战略的适当核心位置。

在千年即将来临之时,人类绝大多数的需要和期望仍可得到简单和明确的表达:即安全饮水、免于遭受暴力——自然和他人的暴力、家庭享有充足的粮食、就业、儿童上学和政府不压迫其公民,而在公民认可情况下进行管理。

我们不应忘记,造成目前危机的部分原因是过去几年忽视政治因素,当时曾有人认为仅市场力量就会带来全球繁荣。人们有时在财富迅速增加的欢愉中忘记,从长期看,一个健康的经济取决于健康的政治:即廉政、社会正义和法治政治。

我不是说把一种人人皆适宜的政治模式作为解决全球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这将同目前在许多国家失败的人人皆适宜的经济政策一样误导人们。在政治学 and 经济学中都必须铭记地方传统和情况。但某些原则对各国来说都是共同的。

这些原则包括合法、关心人民和廉政的政府而无论其形式如何;尊重人权和少数人权利;言论自由;以及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如果无视这些基本和具有普遍性的支柱,政府和经济的结构就不够充足,并更有可能在风暴来临时垮台。这意味着,全球化构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最广义的廉政挑战。

现在让我简短地谈谈联合国去年的工作。我将不概述我的年度报告而使大会感到厌烦,我相信各位现已通读这份报告。但请原谅我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若干成功,并坦率告诉大会我认为我们目前失败的地方。

我感到最愉快的不是我们自己所作的工作,而是联合国同各非政府角色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合作,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全球民间社会的胚胎。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游说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政府组织联盟就是去年两个光彩夺目的范例。

前者是支持关于杀伤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驱动力量,我要高兴地表明,该公约上星期获得了40个国家的批准而生效。后者当然有助于我们制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我曾在7月份荣幸地在罗马目睹该规约获得通过。该规约终于有希望提供国际法律制度长期缺少的一环:即审判种族灭绝、侵害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等国际社会最严重关切罪行的常设法院。本月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提出了国际法院对种族灭绝罪行作出的第一份判决,这向我们表明,国际司法机构可以具有强制手段。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期望国际刑事法院不久实现其目标,即结束凶手杀一人比杀十万人更可能被定罪的可耻时代。

在民间社会帮助下,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正逐渐加强国际法律秩序。《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使我们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责任。

在建立法律准则和加强人权方面我们从民间社会得到的帮助是全球化的积极方面之一。但这里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利用新的开放度和通讯技术的非国家的参与者并不都是那么用心善良的。与全球文明社会并存的还有我称为非文明的社会:恐怖主义、走私贩卖——包括人口走私和非法物质的走私——以及犯罪组织网络。

几个星期前,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恐怖主义爆炸,让我们看到了或许是这个不文明社会最可怕的一面。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显然需要用全球性行动应付。会员国的单独行动,不论是针对国家或非国家方面的,本身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付这一威胁。

恐怖主义使我们震惊的是它不加区别的破坏。不幸的是,我们还必须担心目标较具体的暴力。我遗憾地报告,今年攻击联合国有关人员的事件急剧增加。这促

使我们考虑我们派遣文职人员进入交战地区的条件,那里的交战者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尊重他们的中立地位。

我也遗憾地说,这些攻击的肇事者几乎从来未得到惩罚。让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有了规定蓄意攻击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工作人员为战争罪的罗马法规,情况会开始变化。

我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对工作人员和联合国履行其使命的能力负责。但不幸的是,整个人类还要担忧一个更大的威胁。过去一年中,联合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开展从事了敏感的缔造和平外交,而且条件常常是困难和危险的。我本人曾去伊拉克争取使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得到充分遵守——不幸的是仍然还没有实现。

在其他地方,我相信我们在预防冲突方面有所成功,虽然谁也不能绝对地证明,没有我们的努力就会发生冲突。

相比之下,在我们失败的时候,结果往往十分明显。事实上,我们距离实现联合国缔造者给我们规定的首要目标,即“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还相差很远。

近日来,我感到特别痛苦的有两个例子:阿富汗境内的继续冲突及其践踏人权的可怕行为,现在有几几乎使邻国加入的危险。在科索沃,国际社会似乎是束手无策地坐视我们曾经在波斯尼亚看到的野蛮和任意践踏的情况重演——我们曾经发誓决不让这种情况再发生。

我们再次发现,在我们应该解决造成冲突的政治根源的时候,我们却在采取绝望的人道主义努力,应付冲突的后果。

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已把这两项冲突列入议程,我只能希望,它将找到有效的办法,使当事各方遵守他们的《宪章》义务。

与此同时,核毁灭的阴影继续骚扰我们。众所周知,又有两个国家今年选择首度进行核试验。

最后,我必须谈谈我的大陆非洲。那里也有成功的例子,突出的有在塞拉利昂恢复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今年四月,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我提出了一份关于非洲冲突原因的报告,反映良好。我们也已作了一些有用的后续工作。

然而,不仅许多国家的冲突仍在继续,而且还发生了若干新的冲突,而且其中一场冲突是在两个会员国之间。

我特别关切安哥拉和平进程显然在崩溃。联合国在安哥拉作了巨大的努力,以促成和平,特别是在阿利翁·布隆丹·贝耶先生的领导下。贝耶先生6月去世对我们大家是一大打击。

而且我认为,最糟糕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新冲突。现在至少已有五个非洲国家的部队介入这场冲突,它给大湖地区长期的苦难带来了新的变化。我为这一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深感关切,近年来,他们倍受痛苦,包括蓄意煽动种族仇恨的祸害。国际社会需要特别努力,才能在那里恢复和平,结束苦难。

我对用这样严峻的话来结束发言并不感到有欠意。我的用心不是要叫大会绝望。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在这一大会堂中的人能真正下定决心,汇集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分歧搁置一边,携手努力,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到的。

特别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到和平与经济安全之间的联系——这是作为本组织基础的统一原则。我们需要再次认识本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逝世和本组织诞生那年讲的话。他说,

“我们不能孤立的和平生活,我们自身的福利取决于遥远的其他国家的福利。我们已发现,我们必须作为人来生活,不能做鸵鸟,也不能狗占牛槽。我们已懂得必须做世界公民,人类社会的一员。”
(1945年1月20日,第四次就职演说)

换言之,他懂得如果没有发展,如果最贫穷的人没有希望,那么地球上最富有的也不能安全。

本大会不缺工作。我已经占用了大会很长的时间,我感谢各位的耐心。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们已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10的审议。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我请一般性辩论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要提请各位注意9月15日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即在一人发言后,不能在大会堂内道贺。

这方面,也让我提请各位注意在同一次会议上作出的另一项决定,即一般性辩论发言者发言结束后,应从在讲台后的GA-200号房间离开大会堂,返回座位。

我还要提醒各位代表,依照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发言名单将于1998年9月23日下午6时截至登记。我谨请各代表团尽可能准确地说明估计发言时间。这将有助于大会的工作。

我现在要提请各成员注意第51/241号决议附件第21段。大会在该中对一般性辩论中的每一次发言提出了最多20分钟的自愿限时准则。我谨呼吁发言者在这一时限内以正常的速度发言,以便发言内容得到准确翻译。

我现在请一般性辩论的第一位发言者、巴西外交部长路易斯·费利佩·兰普雷亚先生发言。

兰普雷亚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令我们巴西人尤其感到高兴。巴西和乌拉圭是为姊妹国而成立的,我们之间的纽带正日益牢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命运也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与我的朋友迪迪埃·奥佩蒂密切进行了合作,这使我可以肯定地说,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将是出类拔萃的。在履行这项任务时,你将从你的前任所树立的榜样中得到惠益。赫纳届·乌多文科先生在主持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时,给予各代表团以指导和动力,并为秘书长提出的改革建议提供了宝贵的推动力。

秘书长全力执行联合国革新任务,最重要的是他在有关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他应得到我们的称赞。科菲·安南先生表现出的外交才干和沉着果敢素质证明,他是一位能够应付我们面前各种挑战和机会的领导人。今年7月,我们曾有幸在巴西欢迎他到访。

目前这段时期的明确特征是,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在1997年最后一个季度,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当时所称的“亚洲危机”的冲击波。自那以后,世界经济一直深受一种其范围、深度和持久度仍不明朗的现象的影响。但是,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管,任凭事态的发展来揭示我们所处的窘境。

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尽力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既是合情合理,也是必要的。在一个各国经济迅速融合的时代里,日益需要各国政府通过国际领域的协调来采取此种行动。

尽管对我们所面临危机的范围以及其预计持续时间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在资本流动的高度易变性方面似乎意见日趋一致。过去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一方面

金融领域日益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现有国际对话与协调机制效力甚微,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距。

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自政府成立以来一直在吁请世界其他领导人关注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的任务。自1995年开始,他多次致函七国集团成员,提出下列具体建议:加强各货币管理机构间的合作;扩大对世界金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之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提高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监测能力;扩大稳定遭受投机冲击的货币的机制。当然,在其中一些方面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所采取的措施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目前为止,政治意愿与局势的规模和严重性不相称。危机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协力对付危机。

如同在国际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七十年代被巴西外长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描述为“拖延综合症”的心态。

经验告诉我们,不采取行动就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经验还告诉我们,各国针对危机局势所采取的对策如果是基于不理性或一时冲动的反应,那么便可能使危机局势转变为严重的问题,使其影响长期延续,并加剧人们的苦难。

我们可以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即我们回复到封锁的经济模式,回复到追求无法实现的自给自足和自我孤立的时代,恢复到以不信任他国和令他国不安全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概念。此种现象绝不能成为现实,我们不能允许它成为现实。

国际关系的进展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把国际舞台看作是可以汇集各方意愿与资源来减少危险和克服困难的环境,而不是潜在威胁的根源。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各国只能独自解决难题的世界。这样做的代价肯定要高于通过竭力回避他国问题所节省下来的能量或资源。集体解决问题的意愿将促使各国相信,争取国际社会探讨解决直接牵涉它们利益的问题能给它们带来惠益。世界不能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国家调动或领导国际社会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努力意愿、能力和兴趣。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出现象目前金融危机这样的局势,因为出现此种局面时,尽管实际情况中不可否认地带有国际性质,但各国政府和社会根本就不完全相信现有的任何组织或机制能提供支持、指导,甚至是解释目前

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日益相互依赖关系要求必须在国际一级进行有效的管理。

我们面临着一种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仅仅革新决策程序或行政结构,除此以外也需要如我们在讲话和发言时一样,优先重视多边解决问题。

各方已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一级处理人类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但同时各国政府和社会坚持不按这一认识采取行动,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很大距离。这一点极其明显地反映在分配资源和采取会产生外部影响的政策方面。

同样,如果说国家与国际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那么和平与发展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受经济动荡或绝望摧残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战争、冲突和暴力威胁的安全环境。反之亦然: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起码安全与和平共处条件的前提。我们必须在两个方面都取得进展,必须在政治和战略领域以及全球经济大环境中建立一种信任气氛。

巴西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我国历来的国际行为是我国信誉的部分重要证明。我国成熟的民族和巴西经济的强有力现代化更有力证明了这些信誉。

在卡尔多佐总统领导下,我们已重申我们永远愿意在建设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精神指导着巴西,尤其是在联合国之内的国际行动。

我愿指出,以塞尔索·阿莫林大使为首的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忠实地反映了巴西外交政策的这一中心指导方针。

我们在1998年完成了对国际不扩散制度的参与。我们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并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巴西国民议会在今年7月予以批准。三天前在华盛顿我十分高兴地在我国驻伦敦和莫斯科大使陪同下亲自存放了加入《不扩散条约》的文书。

这些决定是对承诺只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的正式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支持。这一承诺神圣载于巴西宪法之中,并有我们所签署的双边和区域条约给予加强。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现存的协定和合作以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在这一领域堪称楷模的成就。

因此,巴西尤为积极地呼吁核武器国家和具有生产这种武器能力的那些国家采取实现裁军的决定性步骤。我们还期望尚未参加《不扩散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和其他相关文书和机制的各国政府将会尽早参加。

今年6月9日巴西同其他7个友好国家一起签署了《关于无核武器世界的宣言:新纲领的必要性》,这体现了推动我们为这一事业努力的决心。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我们同该宣言的其他伙伴一起试图提出一项旨在促进和指导为全面和最后消灭核武器的努力的一项决议草案。

已经不再有余地和理由推迟在核领域或在消灭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广泛的斗争中的行动了。做不到这点的代价将是真正具有灾难性的,而且其风险对所有国家也是明显的。

作为《里约热内卢议定书》保障国协调方,巴西政府一直在作出持续努力帮助厄瓜多尔和秘鲁尽早积极和最终地就几十年来使它们不和的边界分歧达成具体、最终的协议。我们的外交部门同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外交部门一起——随时准备继续作出最佳贡献。

最近的事态发展证实和平进程行将结束的论断,并反映了厄瓜多尔和秘鲁为实现该目的而努力的意愿和高级别参与。

南美洲是各国基本上在和谐、和平和日益一体化的方式中生活的地区,这对巴西来说是我们各国人民决心保持的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特点。

这也适用于我们大陆各国普遍存在的永恒民主政权。它是我们在《南锥体共同市场》(南方市场)、里约集团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集体承诺的更为崇高的价值观。

民主国家的出现和巩固是南美国家从事的非同一般的一体化工作中的决定因素。这是我们各国社会的一项成就,该地区各国政府必须随时准备作好一个整体捍卫这一成就。这是巴西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

巴西极为重视促进人权。在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之时,我们应承认原则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条例为一方同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为另一方之间持续存在的差距。

巴西政府进行着消除在我国准则和事实之间差距的斗争。我们准备从国际环境吸取有助于我们实现全体巴西人共同愿望的那些因素。这是卡尔多佐总统向国民议会提交承认美洲间人权法院强制性管辖的决定的主要内容。

卡尔多佐总统还致力于反对毒品贩卖的斗争。他出席今年6月大会特别会议便是这一承诺的明证。

我们对建立持久和平努力的参与超越了美洲范围。巴西军队和警察参加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葡语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历史和文化将我们同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

巴西关切地注视着安哥拉的事态发展。联合国必须坚定地坚持安盟履行《卢萨卡议定书》所做的承诺。局势走回头路会危及和平进程已经取得的进展,实际上会是悲剧性的。几十年来,安哥拉人已经蒙受了无穷苦难。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使安哥拉最终能开始重建和发展。

巴西政府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一起正在为几内亚比绍所面临的严重国内危机寻求和平解决。葡语国家共同体同该地区各国密切协作为促进巨大进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将继续创造有利条件以使该姐妹国家紧急、全面实现生活正常化。

至于东帝汶——我们也是由历史和共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巴西欢迎这个微妙而复杂问题上出现了新精神,尤其是在秘书长主持下葡萄牙和印尼政府进行的三方会谈的范围之内。

巴西政府同各当事方保持着积极的对话,并决心尽其可能在帝汶人自己逐步参与的情况下为所有有关各方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自从1994年达到经济稳定以来,随着我国国内市场和具有社会正义的发展前景的加强,巴西再次焕发了活力。

但是今日的巴西并不认为其发展是孤立或不受外界影响的。我们认识到我国经济的命运在一体化进程框架内越来越同我们邻国和伙伴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进程已经明确无疑地有助于该地区的进展和我们各国社会的幸福,尤其是在南方市场之内。

这一进程的成果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仍然是我们地区首要任务的社会正义的事业。

我们欢迎最近一期联合国《人的发展报告》的结果。数字表明,尽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国在过去20年中在健康、教育、反对贫困的斗争以及减少我国各地区之间差距的这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社会进展。尽管我们仍然面对令人生畏的挑战,但是正如我们出现在具有更大人类发展的那些国家行列之中所表明,巴西人正在过着更美好的生活。

巴西基础国内政策和区域作用将在无反常情况下(诸如由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所产生的那种反常情况)继续为争取更平衡的分配经济相互依存的好处而斗争。

这种政策以尤其残酷的方式影响发展中国家,并有利于主张在国内回到封闭经济模式的那些人的论点。在目前全球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求发达国家更好地协调它们的自由贸易论调及其不公平的贸易作法。

卡尔多佐总统说,我们必须放弃排外的全球化道路——在决策进程以及在分配利益方面——而寻求在这两个方面相互声援的全球化。

改革和加强联合国是建立一个进行更大相互声援世界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巴西政府承认联合国在结构和职能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一定不能将改革视为一个事件而应视为一个进程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能不强调,该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尚有待进行。

就巴西而言,改革联合国必然意味着革新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和组成,安全理事会现在反映的仍是早已过去的历史阶段。这并不是说——我过去在这个讲坛上也讲过——应该考虑哪一个国家的具体利益。而这意味着必须解决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的根本性缺陷。我们将继续捍卫两种类别的成员数目都予以扩大,让发展中国家都进入这两个类别。

难以想象,在新的一千年来临之际,联合国的改革可能不会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组。

全球一致的基础是建立起各社会之间的信任。我们要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和建设性的国际环境非如此不可。我们所谓的全球村仍然远远没有成为一种专门可以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的真正一体化的社区。

国际组织有许多优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发展真正的普遍融洽感的互动框架。在应付共同的问题时,各国政府从实践中学习到必须如何更密切地一道努力。在国际讲坛上,我们在不断地编织一个建立在各国之间和各国领导人之间更牢固的特性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各国必须相互信任,但它们也必须要有理由信任多边组织和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便解决自己最重要的问题。

国际生活的生命力要求不断更新工具,使之听命于各国,让各国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时集体行动。

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拖延带来的危险和代价从未如此之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意志作出决定,这些决定能够恢复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对我们有能力说历史在前进、而我们正在让历史朝着更公正、更美好的世界发展的信心。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J·克林顿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J·克林顿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克林顿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大会对我的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欢迎,并指出,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开幕之际,世界有许多事情值得庆祝。在经历了漫长的29年之后,北爱尔兰恢复了和平。波斯尼亚刚刚举行了最自由的选举。联合国正在世界上积极调解危机和防止危机爆发成为战争。今天,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比历史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在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时候,这些权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广泛的拥戴。各大洲的人民过着有尊严和自尊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合国。

当然,正如大会堂内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我们时代的前景同时也有危险。今天,全球经济动荡有可能破坏人们对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信心。我们当中从这种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减轻动荡,将全球市场的实惠扩大到所有公民的身上。美国决心这样做。

我们仍然受到族裔、种族、宗教和部落间仇恨的困扰,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困扰,受到许许多多的国家近似疯狂地努力得到这些武器的困扰。

尽管我们正在努力控制,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恐怖主义仍然没有消失。这是继续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该条表示,

“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在联合国,在世界的国际首脑会议上以及在美国的许多场合里,我有机会详细地讲述过这个问题,描述过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了打击恐怖行动我们现在和今后要做什么。

今天,我要谈谈为什么各国必须将打击恐怖主义摆在我们议程的最前面。显然,这个问题令我们深为关注。在过去15年里,我国公民一再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在贝鲁特、在洛克比、在沙特阿拉伯;在美国本土的俄克拉何马,我们成为自己公民的袭击的对象;甚至在纽约这里,在我们最公众化的建筑中;最近,8月7日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致力于在国家间建筑桥梁的美国人——他们很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一场针对美国的仇恨战中死去。

因为我们是一个富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在全世界积极促进和平与安全,我们常常成为袭击的对象。

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致力于政治和宗教自由、经济机会、尊重个人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很多人将我们看作是被他们所排斥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象征。他们常常愿意把世界各地有深刻根源的各种问题都归罪于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并不对任何和平的国家构成威胁。我们认为反驳这些看法的最好办法是继续我们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工作。对我们来说,从世界上有麻烦的地方撤退、背弃那些冒着危险去争取和平的人、削弱我们自己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就是让和平的敌人得逞,我们永远不能让他们得逞。

把恐怖主义看作只是、或甚至主要是美国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概念。确实,恐怖主义对任何地区的宽容和开放的社会以及无辜人民构成明显的和眼前的危险。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以及你们所代表的人民,都不能免遭这种威胁。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人民无疑不能幸免。在那里每杀害一个美国人,大约就有20个非洲人被谋杀,500多人受伤——他们是在一个繁忙的早晨干自己的事的无辜人民。

北爱尔兰奥马的人民不能幸免,在那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同样受伤和被杀害——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其中有两名孕妇,她们正在那里一起购物时一个留恋过去的偏激集团夺走了她们的未来。

日本人民不能幸免,他们在东京地铁被沙林毒气毒害。

阿根廷人民不能幸免,他们在汽车炸弹摧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犹太社区中心时被炸死。

克什米尔和斯里兰卡人民不能幸免,亟待解决的宿怨杀死了他们。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人不能幸免,尽管他们朝着和平前进,但却仍然年复一年地死去。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幸免,他们在忍受着无比恐怖的恶梦,并且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

埃及人民不能幸免,他们的又一个总统差一点被暗杀。

土耳其、哥伦比亚、阿尔巴尼亚、俄罗斯、以及其无辜人民成为恐怖活动受害者的无数其他国家的人民不能幸免。这些受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但每一个人都是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一条人命因为另一个人的仇恨而被夺走,使他周围的人的生活永远被改变。

恐怖主义已成为世界问题。当然,有些人说这个问题被夸大了,声称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相对较少,有时候少于一年中遭雷击而死的人。我认为这在几个方面没有抓住要害。第一,在1990年代恐怖主义已变了一个样。今天,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更大的开放和信息激增以及武器技术。各种新的恐怖技术和日益容易获得这些技术,在加上恐怖主义分子的机动性日益扩大,这些产生了易遭化学、生物和其他种类袭击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是对全体人类的威胁。

每一次袭击除了实际可见的破坏外,还遗留下甚至更大的心理上的创伤,这种创伤难以衡量,愈合起来却很慢。每一枚炸弹,每一次炸弹威胁,都对自由和开放的体制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个机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建立这些体制如此努力地工作。每次一个无辜的男子、妇女或儿童被杀害,就使我们其他人的前途更危险,因为每次暴力行动都削弱了对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的信心。

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联合国各机构的积极支持下,人们都在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这种未来的基础是把人们同他们的同胞以及同全世界的伙伴和投资者联系在一起信任纽带。人们瞥见北爱尔兰日益增长的繁荣,这是《耶稣受难日协定》的关键因素。但这需要信心,在暴力时期是不能用金钱购买信心的。我们可以用可怕的死伤统计数字衡量每一次袭击。但什么是我们无法衡量的创伤呢?在中东、亚洲、南美洲,有多少协定在炸弹爆炸后一直被冻结?在急需时间和资金投资的地区有多少商业活动将永远不会被建立?在这里代表的各国中有多少有才华的青年人不愿从事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不仅是在每一次袭击中丧失了多少生命,而是袭击的后果使多少人丧失了前途。

没有任何理由可为杀害无辜者辩护。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甚至遭受剥夺和正当的悲愤,都不能成为其理由。我们必须设法了解产生恐怖行动的浑水。我们当然必须这样做。在我的经验中我常常看到在和平取得进展时,恐怖行动就是要使历史潮流倒转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行动。在北爱尔兰和平正在取得成功时发生了奥马爆炸。在中东,每当我们很快将朝着和平迈出下一步时,和平的敌人就对此采取恐怖行动。我们决不能让这拖住我们的势头。消除宿怨归根结蒂是一种信仰的飞跃——与过去决裂,因而对那些不能放弃其仇恨的人来说是一种令他们惊恐的威胁。因为他们害怕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分子就试图把和平缔造者推回到过去。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种狂怒有着经济根源。贫困、不平等以及被剥夺了公权的大批年轻人恐怖主义分子进行诱人的鼓动和声称推动社会正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被剥夺不能成为进行摧毁的理由;也不能用谋杀来讨回公道。杀害无辜不是一种社会方案。

然而,我们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酝酿恐怖主义的条件漠不关心。最近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说,世界上富者和穷者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我们必须更努力地解决造成绝望的根源,以免绝望变为仇恨的毒药。

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写道,只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丧失的人才会成为革命者。我们必须使人们看到,支持合作和谴责暴力只会使他们赢得一切。这不只是美国或西方的责任;这是全世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有义务公开地分配新的财富、创造新的机会、建立新的和开放的经济。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始终走在繁荣的道路上,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一个星期前我概

述了我们可以何种方式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经济,不仅使所有国家、而且使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获益。

有些人认为恐怖主义的主要分界线在于他们认为不同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对这个问题值得在这个大厅里进行很多辩论。具体地说,许多人认为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同伊斯兰文明和价值观念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虚伪的鼓吹者们可利用和滥用任何宗教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辩解——甚至为冷酷的谋杀辩解。有些人可能让世界相信大慈大悲的万能的安拉准许杀戮;但我们不这样理解伊斯兰。

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从非洲到中东到亚洲以及到美国。穆斯林教是我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在美国有 1 200 个清真寺和穆斯林中心,这个数字在迅速增长。在那里作礼拜的 600 万美国人将告诉你在穆斯林教同美国之间没有固有的冲突。美国人尊重穆斯林教。

当我与我国和世界的穆斯林领导人交谈时,我再次看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希望和期望: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中,抚养我们的孩子,遵循我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建立比我们父母所知道更美好的生活,并使我们的儿童得到更光明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是一模一样的。存在着超越种族和文化及宗教的重要分歧,这些分歧需要理解并应得到尊重。然而,每条河流都有越过的地方。甚至当我们在美国这里,同联合国一样,力争使所有美国人和睦相处并在我们日益扩大的多样化中寻求更大团结时,我们将继续保持与穆斯林世界的友谊,并尊重它。我们将继续寻找共同价值观念,共同利益和共同努力。我十分赞同穆罕默德这些话所表示的精神:“人们集体祈祷的报偿是在家里祈祷的两倍”。

关于恐怖主义,在穆斯林人和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塞族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发达社会和新兴国家之间不应有分界线。唯一的分界线是在进行、支持或容忍恐怖活动的人与认为恐怖活动就是谋杀的人之间。

如果恐怖主义处于美国议程的首位,也应处于世界议程的首位,那么我们可以共同采取那些具体措施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义务是什么?我认为至少它们有这些内容:不给予恐怖主义分子支持、避难所、财政援助;对给予的国家施加压力;共同行动以加紧引渡和起诉;签署全球性反恐怖公约;加强《生物武器公

约》，并实施《化学武器公约》；促进更有力的国内法律并管制爆炸物的生产和出口；提高机场安全的国际标准；打击传播暴力和失望的条件。

我们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国情报和执法机构与其他政府合作追查恐怖主义网络。我们认为对最近炸弹攻击我国使馆事件负责任的一些恐怖主义网络已被绳之以法。本周初我要求国会提供紧急资金以修缮我国使馆，改进安全，扩大世界范围反恐怖主义斗争，并帮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朋友治疗创伤。然而，无论我们每个国家单独做多少工作，没有共同努力，我们的进展将受到限制。

我们还将通过国际开发署为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海地和其他地方解决失望和异化的根源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将继续大力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我们也认识到这些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and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支付公平份额的重要性。

最后，请允许我敦促大家以新的方式思考恐怖主义，不把它看作文化冲突或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行动，或神的召唤，而看作旧势力与未来势力、摧毁者与建设者、希望与恐惧、混乱与社区之间的冲突。

斗争将是困难的，但每个国家将在参加斗争，努力使我们五十年前所签署《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具有真正意义的过程中得到加强。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这样做。

埃莉诺·罗斯福是《世界宣言》的作者之一。她在联合国刚成立时支持它的许多讲话之一中说，

“所有协议和所有和平建立在信任之上。除非你们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有信心，否则你们无法有和平，无法与他们和睦相处。”

我们不需要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来获得相互信任。我们不需要就所有世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来获得相互信任。我们甚至不需要理解我们之间的每个分歧来获得相互信任。但是，我们必须确认对《世界人权宣言》首要地位的信念，因此我们一起说，恐怖活动不是通向明天的道路。它只是倒退到昨天，而且一起，在一起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对付它，战胜其威胁、伤害和恐惧。

南非共和国总统纳尔逊·罗里拉拉·曼德拉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南非共和国总统讲话。

南非共和国总统纳尔逊·罗里拉拉·曼德拉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南非共和国总统纳尔逊·罗里拉拉·曼德拉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曼德拉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以南非共和国总统和不结盟运动主席身份真诚地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

你将主持由世界各国组成的这个庄严的大会，在这段时间内，大会的审议和决定对于人类最终实现全球和平与繁荣的不断努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结盟运动以及我国——我国以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而自豪——对本组织寄予极大信任，特别是在本组织历史这个关键时刻，相信本组织将能够履行对所有国家承担的责任。

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将作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50 周年的大会而被世代铭记，这非常恰当。该宣言是在战胜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危害人类罪行之后产生的，该宣言使人充满希望，希望在将来，宣言各条款所载人的辉煌的远见将成为我们所有社会的基础。

对那些必须进行斗争才能争取解放的人而言，对那些象我们这样必须在联合国帮助下摆脱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而言，《世界人权宣言》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与此同时，宣言也是对我们的一项挑战，这就是，一旦获得自由之后，就应该利用自由，努力实现宣言所载的所有展望。

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历史性文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 50 年，在这 50 年里，人类社会演变中出现了极大的发展。

这些发展包括殖民制度崩溃、两极世界成为历史、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以及实现复杂的全球化进程。

然而，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世界人权宣言》所关心的对象——人——却仍然受到战争和暴力冲突的侵害。

他们尚未摆脱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死亡恐惧。

许多人尚不能行使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将使他们能够参加决定自己国家、民族、家庭和子女的命运,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暴政和独裁的统治。

由于贫困,由于得不到粮食、工作机会、饮水和住所、教育、保健和健康环境等基本必需品,每天有数亿人被剥夺做人的基本权利。

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世界各地每个国家内部贫富之间形成鲜明对照,这说明 我们没有实现《世界人权宣言》所预见的未来。

这种贫富共存、以战争解决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各种冲突的做法根深蒂固,世界各地许多人被剥夺民主权利,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而造成的,特别因为那些在政治、经济和人类活动其他领域居于领导地位者所采取的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而造成的,这更具有讽刺意义,更具有挑战性。

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社会弊病都是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些弊病并不是自然力量造成的,也不是上天诅咒的产物。

这些弊病是普通男女作出的决定或拒绝作出决定而造成的,所有这些普通男女都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支持《世界人权宣言》所预见的未来。

该宣言之所以被称作世界性的正是因为本组织创立者以及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灾难的世界各国、包括许多仍然在为其解放而奋斗的国家十分明白,我们人类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

幸福、正义、人的尊严、和平和繁荣等价值观念必然具有普遍性,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每一个人都有权享有它们。同样,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真正地说明他们已享有幸福、和平和繁荣,如果同样属于人类的其他人继续遭受痛苦、冲突、恐怖主义和贫穷。

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人权宣言》的下一个 50 年,以及该宣言必须帮助塑造其特性的下一个世纪所构成的挑战是:人类,特别是那些居领导地位的人有勇气确保,我们最终建立一个与这项历史性的宣言以及自从 1948 年以来所通过的其他人权文书的规定相符的一个人类世界。

我们眼下就面临着非洲、澳洲和亚洲的很多冲突地区。我们所有人都熟悉这些地区,它们包括我们大陆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和苏丹,包括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斯里兰卡。

显然,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道,采取决定性行动以结束这些破坏性的冲突。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消灭夸耀军备和炫耀武力的原始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以下幻觉:正义可以通过杀伤能力来保障;暴力是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

作为非洲人,我们感谢秘书长帮助我们寻求结束我们大陆上的暴力纷争的办法。我们对他的报告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它将加强我们为从我们大陆上消除战争而作出的努力。我还没有从头到尾阅读这份报告,但是我将努力这样做。

1946 年 1 月通过的大会第一项决议谋求处理以下挑战:

“从各国军备中消除核武器和可用于大规模毁灭的所有其他主要武器”。(第(I)号决议,第 5(c)段)

我们必须面对以下事实:在无数行动和决议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由核武器国家作出的关于迅速、最终和完全消灭核武器和核武器能力的明确承诺支持的具体和普遍接受的建议。

我们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姐妹共和国巴西致敬,她已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敦促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其他国家遵循这个出色的榜样。

为了真诚地努力促进确定消灭这些武器及其构成的毁灭威胁所需要的有系统的和逐步的措施,南非与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斯洛文尼亚和瑞典一道,将向第一委员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它的恰当的题目是“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纲领”。

我非常谦恭地呼吁所有会员国认真考虑这项重要的决议草案并对它给予支持。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武器?这个问题对那些提出复杂的论点以便为拒绝消灭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辩解的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幼稚。

实际上,提不出任何理智的回答来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拒绝这样做是冷战的

消极态度的后果,是不肯放弃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显示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优越。

还需要采取紧急步骤,以便在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和尊重这个重要区域的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中东的公正和永久和平。我们还期待着解决悬而未决的西撒哈拉和东帝汶问题,因为我们确信,有可能在满足所有有关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同样,我们还想对极其重要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大胆步骤,以使其恢复民主政治和旨在为全国所有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体。

我们还共同面对着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毒品、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等祸害。我们强烈支持联合国所通过的或正在讨论的措施,以处理所有这些挑战并使我国和我国政府承诺在确保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我国人民免受这些罪行的破坏性影响的所有区域和国际行动中充分合作。

世界正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克林顿总统一周前在这个城市所说的,这场危机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突然陷入贫困,并打乱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使世界各地数以千万计的人深感失望。

克林顿总统还说:

“最近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整个一代人在25年中逐渐进入中产阶级,而在几个月时间内就陷入贫困状态。这些故事是令人痛心的一医生和护士不得不居住在一家关闭后的医院的大厅中;曾经拥有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学,以及到国外旅行的中产阶级家庭现在以出卖其物品维生。”

柯林顿总统曾表明,世界经济的“湍流”

“给俄罗斯和亚洲带来了问题,或使其问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危及从拉丁美洲至南非的各新兴经济国家”,

他还谈到为经济理论牺牲生命。

他进一步承认,随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都处于经济下滑之中,用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

“‘不会永远成为繁荣的绿洲。’国内增长取决于国外的增长。”

我这样冗长地引用美国总统的话是因为他的意见正确,而且还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因此,我们愿相信,尽管人们都承认全人类特别是穷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但该强国在确定要采取的正确方针,并根据这项方针处理已确定的挑战时,不会丧失勇气。

柯林顿总统所描述悲剧远远不只是他正确提及的中产阶级突然变得贫困。贫穷一直而且仍是更多的普通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矛盾的是,资金在世界各地破坏性快速流动使全球贫穷的挑战成了清晰的焦点。

坦率地说,目前情况是,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不但没有促进全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反面以令人畏的快速度产生着贫穷。

人们再也不能忽视对这个紧迫生死攸关的问题采取行动迫切需要。不应通过设法尽量多地指责穷国来逃避这样一个关键挑战,即确保南方国家获得世界经济积累的生产资源。

显然,所有相关问题都必须得到处理,其中包括增加长期资本流入、贸易条件、勾销债务、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开发、妇女解放和青年发展、消除贫穷、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环境保护、以及加强同持久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金融和其他机构等问题。

幸运的是,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已不再争执不休,即还必须作出认真努力,调整多边金融和经济体制,以便使它们处理现代世界经济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回应世界上穷国的迫切需要。

同样,本组织包括其重要的安全理事会,也必须完成其自身的改革进程,以便使它根据其确立的各项宗旨,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提及的各种问题都曾在本月初在南非德班市召开的第十二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得到全面讨论。

我谨向大会和联合国推荐该重要会议的各项决定,其中包括首脑会议一致通过的《德班宣言》,我相信,不结盟运动通过的各项决定将大大有助于联合国的工作,并进一步促使南方国家为解决世界穷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荣幸地站在这个讲台向大会发言。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生,并将在世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时告别公职,我在所有男

男女女都按其应该的那样得到这个机会时,走到了漫长道路中的这个阶段,即在我出生的村庄里退休,而得到一些休息和安宁。

当我坐在我的村庄库努中,变得象其群山那样年迈时,我将继续抱着这样的希望,即希望我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我的大陆乃至世界出现一支领袖队伍,不允许有任何人象我们过去那样被剥夺自由,不允许有任何人象我们过去那样沦为难民,不允许有任何人象我们过去那样注定挨饿,也不允许有任何人象我们过去那样被剥夺其人类尊严。

我将继续希望非洲的复兴不论季节变化而永远根深蒂固并繁华似锦。如果所有这些希望都化为可实现的梦想,而非折磨老人灵魂的恶梦,则我就一定会享有平静与安宁。那时历史和全世界几十亿人就会宣告,我们当时怀有寐以求的理想并为献身这个可行的梦想而辛勤劳动是正确的。

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先生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布基纳法索总统讲话。

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孔波雷总统(以法语发言):我不无激动地以布基纳法索国家元首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的双重身份来到大会,在这一各国神圣的论坛上宣扬和平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为我们时代和后代促进和平与安全是汇聚在这里的世界各国的目标。这也是我代表非洲带来的信息,深信怀着这一巨大的希望密切相联的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能使人类希望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命运的正当愿望变成现实。

但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和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以及相信你们能使这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也祝贺你的前任乌多文科先生以充沛的精力履行他的职责。秘书长先生,我要祝贺你和你的工作人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完成了工作,并为有待打赢的战斗提供鼓励。联合国把和平的火炬一天比一天举得更高,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整个联合国系统。

将要结束的世纪将被人们记住是一个充满巨大挑战的世纪。它经历两次世界冲突的震撼,它也汇集必要的资源,敲响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丧钟。

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领土的解放对为我们文明确保更大正义、安宁和福祉具有历史必要性。这一文明最终认识到,它的生存在于组织真正的集体安全。然而,冷战导致两极对抗。这一对抗又因意识形态的敌对而加剧,使这一安全成为幻想。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得到巩固。没有权威能够制止的冲突和动乱随之迅速出现。这些危机的迅速抬头以及用来解决这些危机的办法的不足使人们联想起神话中那些被罚装进一个无底桶的神话人物达那伊得斯姐妹的困境。

国际社会未能在索马里恢复和平,未能在卢旺达预防种族灭绝,这将成为非洲大陆历史上的突出点。这一失败无疑大大促进唤醒了我们昏睡的良知,迫使我们面对自己。它向可能仍有疑虑的非洲暴露了联合国的限度。

因此,21世纪以这种承认而告结束,它虽然使那些因多种原因而仍然受古老的人道主义幻想哄骗的人感到吃惊,但至少是现实的,并属于一个正开始的新时代。这是承认,非洲为之付出这么许多的联合国,在非洲争取平息无数紧张温床和确保其发展的斗争中,不能为该大地包办一切。从这一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非洲必须承认这一现实,接受这一现实。1998年6月10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第34次大会集中讨论这一新的现实,这一现实激励和命令非洲掌握自己的命运。

国家元首们评估应由他们承担和由此产生的责任的范围和重要性,决定肯定他们的共同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集中精力于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的冲突。这项承诺必将确保非洲统一组织及其非洲大陆上的各种区域组织更加活跃地寻求和平办法解决这些冲突。

虽然非洲管理自己事务的经历不长,但在管理和解决某些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这些结果应该在这里得到赞扬。因此,非洲人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

我热切希望把这一经验扩大到整个大陆,用于最老以及最新的危机。从现在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预防还不够,不能保证和平的任何地方,非洲都必须更加有系统地参与冲突的管理和解决。

为此目的,非洲人自己已经提出了加强非洲大陆快速反应能力的倡议。这些倡议比所有其他倡议的优势是,它们是非洲人的倡议。这些倡议要发展和执行,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毫不含糊的支持。从一个次区域到另一个次区域,这些倡议毫无例外,需要得到协调的发展。

非洲冲突的数目和复杂性越来越令人不安。预防、管理和解决这些冲突需要有适应当地条件的牢固和可靠的机制,专门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机制。没有这些机制,非洲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世界问题是巨大的、复杂的和令人担忧的。孤立地解决建立和平问题极其困难,这使多边外交在解决冲突方面有了日益扩大的作用。

联合国各区域组织如非洲统一组织,能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很大贡献。比如,非统组织有一种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这种机制 1993 年创立于开罗,我们现在正在确保它具有有效性和实用性。它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塑造一种真正的预防性外交的熔炉。

这极为重要,因为冲突的后果,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因此,在体制一级我们有能力应付冲突,而且我们也有这样做的意愿,因为正如我在第三十四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强调的,

“非洲的安全与和平问题首先是非洲人关心的问题。长期而言,任何机制如果从外部强加,都没有任何有效地成功的希望”。

副主席巴莱·斯特拉先生(圣马力诺)主持会议。

当然,外部资源如果是真诚的,那么它始终是令人欢迎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复杂和不断变化的领域,协调一致的坚决行动只会带来好处。我已强调过,冲突局势的处理往往需要部署超出我们各国能力的人力、物质和财政资源。因此,国际组织应继续显示出对非洲的支援与协作。

因此,我欢迎联合国以其丰富的经验,不仅促进从结构上加强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机制,而且帮助提供技术和后勤支助,因为归根到底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确保我们的世界享它他的发展和繁荣所需的安全与和平。

在这场对国际支援的考验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非洲绝对而且首先必须依靠自己。我们非洲人意识到,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自己确定命运。为此,我们大

陆上没有任何国家不为建立一种有利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内部气氛而作出一切牺牲。经过多年的动荡不安和停滞之后,非洲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胆的改革使经济出现明显复苏,公共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更加严格与合理。在管理和良好治理方面正逐渐走向透明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些能逐步塑造非洲人共同命运的同类型分区域,这要归功于我们一体化原则和长期的措施协调一致。对此,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二十一世纪前半期建立一个非洲经济共同体。

目前非洲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是和平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非洲政府和人民不断开展斗争,每天都致力摆脱不发达状况,在此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们知道如何依靠朋友的真诚支持。其中包括联合国的业务发展系统。我要赞扬它竭力推进消除贫穷和非洲人民所遭受的其他形式匮乏的斗争。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在维护非洲人安全的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联合国机构——仅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两例——财政资源正逐渐减少,而交付给它们的任务却需要加倍的努力和资源。因此,我呼吁所有国家表现出诚意,为 1 联合国业务发展系统提供所需的资源,以帮助非洲应付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就债务问题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符合条件的国家开始进行改革的同时,理应重新安排其偿债期限。债务是我们仍然脆弱的经济体不堪承受的一个负担,这一点似乎无需提醒。

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进行大胆尝试的手段和有利条件,但条件是,我们必须清楚确定我们的目标,使我们各国人民参与迎接挑战,推动非洲不断争取进步。不可否认,由于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协作精神,因此它对国家的独立和主动性有所制约。但是如果富国和穷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无情地加大,人类怎么能继续繁荣下去?

因此,现在必须重新认真思考国际机构在规范全球化经济以确保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之间平衡方面的责任。为此,对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进行改组,以使之成为实施正义、公平和民主原则的真正工具,不仅是绝对很必要的,也是极其适时的。

非洲国家占联合国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不可接受的是,在联合国成立 50 多年后,整个非洲大陆却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矛盾的是,所辩论的大多数问题又都是非洲问题。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如果联合国实行的是公平原则,那么在国际法院已作出裁定之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已通过决定和决议要求取消制裁之后,针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制裁还会继续下去吗?今天,安全理事会第1192(1998)号决议已强调在解决这一争端时应坚持法律至上。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实现透明度,以使审判能够在照顾受害者和利比亚人民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完成。

此外,非洲希望,对于喀土穆一家制药厂被炸一事,安全理事会能向苏丹派遣一个调查团。

非洲强烈谴责所有形式和现象的恐怖主义,并呼吁我们这个世界组织为坦率地辩论这个问题以及为采取有力而一致的行动对付这一现象创造必要条件,同时要牢记,因经济或历史情况而导致的愤怒和挫折感如得不到解决就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能力。

同样,联合国可以继续否认象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现实吗?那里的2200万人被剥夺了对联合国活动作贡献的机会。

非洲已走上希望之路,我相信这一点。我仍然深信,非洲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障碍非常需要它的后代重新找到通向统一的道路,从而使他们能有效控制其命运。没有联合,非洲将继续处于历史的边缘。常识告诉我们,我们非洲人必须永远摆脱伸手求援这一丑陋形象,并订立维护友谊、尊严和自尊的契约,使彼此能精诚团结,慷慨相助。我们追求独立并不否定各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它意味着形成对人权和各国人民权利的新理解;它意味着自己有责任明白如何保持自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布基纳法索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特别荣兴地欢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发表讲话。

桑吉内蒂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乌拉圭今天来到大会,怀着喜悦、自豪甚至激动的心情看到你,主席先生,我们的一名同胞代表乌拉圭担任大会主席。乌拉圭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并自那时起一直是联合国所有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它甚至贡献了它最好的士兵,他们在艰难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

在联合国创造之时,我国怀着正在对重建这一世界的希望和梦想加入了联合国以揭开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时代。它的确没有抱着对权力的任何梦想来到这里,它在我国无处容身,因为我国国土小、经济也相对小。但是我们的确怀着激励所有我们伟大的政治家的梦想——成为一个模范小国的梦想,它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实现了普遍、免费和义务的世俗教育,并建立了以牢固的中产阶级为其政治民主基石的一个福利国家。因此我国感到它是各国民主发展的一个根本部分。

不幸的是,我们为能免受冷战动荡和后果之害。如大会所知,冷战在拉美是血腥和激励的。各半球陷于争夺地位冲突之中:这里是游击战,那里是政变,两种表现本身都是可怕对立的一部分,民主国家在这种对立中受到伤害,有时垮台。

过去几年表明乌拉圭是经济和繁荣正在大步前进的一个国家,并且如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人的发展指数》所说,它正在再次取得进展。它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第三位,而且我们能说就贫穷指数而言,我们在该半球已经实现最佳改善。

但是,我们前来参加本届会议时不仅怀着对其机构和始终贯穿着大会精神的和平的关切;我们来时还看到了一场危机的魔影,这场危机开始是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今天它已成为牵动我们大家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这毫无疑问理应受到特殊关切。在我们看到尤其心里不正常的气候使股市失控之时和在看到这么多的不合理现象扩散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样,他把生命看作各种力量之间的一场斗争,对于这些力量,我们总是不能得知那一力量是最强大的。有时似乎是科学和智力占上风。另一些时候似乎风狂和恐惧占上风。这也是以一场金融危机开始,后来成为一种十分奇特的心里现象的这一现象的一个部分。问题是作

为拉丁美洲人和作为国际社会一个成员国,我们必须再此面对这一局势。

莎士比亚(他往往在同重大悲剧有关时被人们引用)说,发牌的是命运,但是打牌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在这场危机中我们怎样打牌,这场危机甚至不仅只是影响各国金融和经济,而且会影响我们各国的民主稳定、我们的社会太平以及激励我们的各种根本价值观念。

在1980年代,拉丁美洲经历了十分艰难的经济年代。这被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在这些年份中我们巩固了我们大陆最强大的民主化进程,今天这使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民主国家和自由。以前从不知晓民主的国家现在正在建立各共和国和机制,并正在发展其社会。

事实是在那次危机之后,我们各国作出了巨大的变革努力。它们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开放了经济并开始了一体化的强大进程——在安蒂斯山地区、北面在墨西哥和在南面同我们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和现在在南面有作为参与伙伴的玻利维亚和智利。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曾有一个再次生长壮大的拉丁美洲,它将会再次成为进行投资的地方一个能够将民主与和平的好处同经济增长协调起来的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新的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要巩固和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我们应该在这里,在这一机构(它是国际主义的一首赞歌)以及在经济领域进行这项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泛美发展银行——它是我们半球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工具。我们必须加强这些工具。

的确,一旦这场危机过去,它将留下后果。由于某种原因,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声明建立时,凯恩斯勋爵和哈里·怀特之间进行的辩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仍然余音未绝。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各央行中应有一个央行。我今天不把那场辩论带到这里来,但我想一旦这场危机的关键时刻过去之后,就不得不进行一场辩论。因为必须预防而且需要有一个真正起作用的市场经济。

我们都会感到、都会知道,这次危机的起因已经找到,首先存在着过多的投机活动,这明显地反应在股票市场上。危机还起源于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调,这些国家无法纠正这些失调,主要是财政上的失控,而这正是当前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幸运的是,北美和欧洲经济看来依然稳固。我们都希望日本能够复苏,这样,今天采取的措施就能够使我们更平静地看待局势的走向。这种局势很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正如巴西外交部长今天所讲,这次危机的程度之大和持续的时间是无法预见的。但各国的行动不应是不可预见的。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终止那些财政失调,避免与这些危机有关系的错误和诱惑。首先,我们不应认为采取新保护主义让自己孤立起来就能够走出危机。

80年代,我们拉丁美洲经历过外债危机,当时有人主张不偿还债务并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更受保护的经济学上去。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安排债务,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社会以便重新增长。只有实现经济增长,今后才能使外债变得可以驾驭。不幸的是,前者并不幸运,后者却很幸运。这样,我们能够重新安排外债,重新投资,而增长使我们有效地偿还了债务,因而为我们的人民实现了较好的生活条件。

动荡和投机并不是贫穷的人民繁荣起来所最需要的。相反,投机者赚钱的机遇却给大多数人造成损害。

这就是我们今天清楚地为这种局势确定的道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照此加倍努力。我们还必须加强和更新国际金融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安全网,使我们和平的进行工作。

当然,主要经济国家有重大的责任。克林顿总统上周讲过,这是本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经济财政危机,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主要经济国家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些较小的经济来说,既使我们没有能力和机会为世界带来好的消息,我们也基本上只是追求日趋平等的生活条件,尽力不给世界带来坏的消息。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在新保护主义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必须努力争取日益开放和透明的市场,较大国家持续的补贴正在这些市场消失。这些补贴是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农业补贴,无疑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带来麻烦的因素,应该放弃。如果说危机给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我们应该寻求平衡,但不能再继续给人为经济部门带来机遇的补贴的基础上实现平衡。

我们还应保护自己,不上救世主式的煽动的当,这种煽动是这次危机的政治方面。正因为如此,通过国际合作和具体措施化解并解决危机从民主的角度而言也非常重要。在这种动荡出现时,救世主式的煽动者便出现了,他们就是那些变换手法鼓吹繁荣的人,但却总是给人

们带来不幸;值此动荡之秋,我们不能再给这些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因此,这是一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最终也将是一场政治民主的危机。这是关键的一章。我们必须继续工作翻过这一章。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使人手足无措的时代。1989年,正值市场经济战胜了社会主义经济,自由民主战胜了共产主义世界,看起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和平稳定时代,古老的黑格尔辩证法将让位于合题境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另一些人称之为独立思考。不幸的是,这是过于简单化了。

今天认为我们再次进入资本主义危机也是一种过于简单化。在我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我曾多次被邀请参加资本主义的丧礼。时代无疑已经表明,具有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的市场经济能再次的复苏过来;现在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此,我们不能再次过于简单化看问题。我们曾经相信仅仅开放市场就能产生奇迹;实现增长和平等。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认为通过闭锁的经济、通过更严格的保护主义措施、或通过专制主义能够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原则下加以解决的局面。

没有人拥有明确的地图。因此,更应该重申基本的原则,首先是政治民主,正如克林顿总统早些时候提到的,政治民主要求我们打击那种从外部以暴力攻击各种形式民主的恐怖主义;要求我们打击民主内部滋生的敌人。我们常常因为过渡政治热情而受害,这种过渡的政治热情常常导致国家内部的分歧、不容忍、种族仇恨、经济权利的滥用和媒体的滥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如果不根据道德规范运用,这些因素就会削弱民主。

我们也有权要求公民参与。加强民主不是凭借被疏远的或对事务漠不关心的公民就能够办得到的。民主将与有效的国家密切相关,因为如果目标是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那么只有有效的国家才能团结一致;只有一个并非制造浪费的机构,而是一种增进社会力量的有力工具才能团结一致;民主将与市场经济和建筑在保护我们免遭不公平竞争侵害的标准上的日益开放的贸易密切相关;民主将与诸如拉丁美洲国家所实行的那种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这种一体化进程的目的是使我们建立适当的经济加入世界,以期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我们还想到我们各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诸如家庭,家庭是我们文明的历史核心。削弱家庭就会产生许多弊病。今天,毒品贩运是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忘记了精神价值观念的各国社会的精神灾祸。这些社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削弱了家庭,在这个世界里各种虚像、空虚以及各种转瞬即逝的趋势造成了一种真空,这种真空又造成了谋求旨在取代有意义的生活的虚假的乐园的现象。我们必须加强各种精神因素,以使民主具有真正的内容。

当然,在经济事务中我们必须采取现实态度,但现实主义本身并不能使各国人民的希望不会落空。正如我们的朋友曼德拉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加强家庭价值观念、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普遍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尊重种族的独特性;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都必须反对种族歧视;我们都必须尊重并清楚地铭记文化多样性。但任何种族和文化多样性都不能认可奴役妇女或屠杀男子;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普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精髓,我们不仅必须宣布并且必须实施这些价值观念。

汤因比说,“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一次航行,而不是一个港口”(《读者文摘》,1958年10月)。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辨别指引我们航向的明星。乌拉圭信赖的正是这些引航的明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夫人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将聆听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夫人在陪同下走入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夫人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她向大会讲话。

库马拉通加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斯里兰卡最热烈地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主席。我们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并毫不怀疑你将智慧、技能和决心指导这届大会工作。

大会还应感谢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阁下,感谢他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上作为大会主席发挥了明智和敏锐的领导作用。今年斯里兰卡庆祝它独立五十周年大庆。我们在1948年恢复独立,结束了将近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统治。我们在我国土地上接纳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我们坚定地坚持生活的民主方式。自1931年以来我国人民就一直实行普遍成人公民权。我们有政府议会制制度,定期举行选举,参加投票的比例特别高——高达平均80%。我们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新闻媒体。法制得到遵守和尊重。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并得到合理实施。我们始终关心保护人权问题,即使在一些一心要摧毁我国民主社会的无法无天的人进行严重挑衅时我们仍这样做。

斯里兰卡在获得独立后不久就成为联合国的一名成员。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在《宪章》序言部分表示他们决心使后世免遭战祸。他们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的信仰。他们承诺要建立一个遵守国际法和条约义务的环境,促进所有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联合国已成功地履行了它关于使世界免遭全球冲突灾难的基本承诺。

但在撰写《宪章》50多年后,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世界比创立联合国时的世界更安全。全球核裁军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尽管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任意扩散,不顾人类的安全。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缓和,但拥有这些武器的核俱乐部的成员们没有表现出销毁这些武器的意愿。联合国有责任加倍努力实现裁军目标。这是我们对全人类、对未出生的子孙后代承担的义务。我们不接受所谓这些武器在某些人手里是安全的这种理论。

不结盟国家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开始谈判一项方案以期在一个有时限的框架内彻底销毁核武器。

1976年我的母亲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作为斯里兰卡总理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在大会讲话时是这样谈论裁军问题的:

“近三十年全面彻底裁军一直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宣布的目标。

“尽管本组织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世界却甚至没有看到裁军的迹象,而是看到争夺拥有摧毁性力量的霸权,其依据是这样的神话,即只有通过

大张旗鼓的和一心一意的备战,并使战争技术精良和尖端化,才能维持和平。这确实令人悲哀地反映了二十世纪的道德和智力标准及其价值观念,反映了这样一种优先次序,即把世界上这么多的资源[浪费在]生产可怕的武器上,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消除贫困、无知、疾病和饥饿……

“[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理论,即裁军是拥有战争工具的大国的专属领域。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享有和平的权利,正如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一样,维护和平的责任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不结盟国家呼吁举行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商定举行一次世界会议。”(A/31/11,第37-39段)

在最近于南非结束的在纳尔逊·曼德拉总统主持下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该运动再次表示关注全球核裁军问题。今后几年,大多数国家要求裁军的呼声将增加。不结盟运动一贯要求设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就在时限内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案开始谈判。此外,还有一项关于核武器公约的提议。在我们接近新的千年时,我们必须处理这些挑战。我们越长时间地躲避责任,今后的危险便越大。

今天,我荣幸地作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新任主席在大会上讲话,南盟几个月前在科伦坡举行了会议。南盟代表五分之一的人类。南盟继承古老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丰富和复杂的多样性。

与任何其它主权国家联盟一样,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我愿表示深信,我们去年和今年的首脑会议标志着本联盟生命的转折点。我们的领导人知道,我们对本区域数亿居民共同负有巨大义务。我们决心丢开围绕我们一些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分歧,一致联合努力来改善我们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我从科伦坡首脑会议带来的信息是,在本区域加强经济、技术、社会和科学合作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这是我们各国领导人的意愿,这种意愿在科伦坡首脑会议上有力地反映出来。我深为感谢我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事,他们提供了宝贵意见与合作,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总理对集体区域利益和关切表现出友谊与谅解的崇高精神。

南盟,同不结盟运动一样,也认识到在我们周围激荡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两种相关浪潮既有繁荣潜力,也有危

险的不均衡发展新进程的种子。必须记住,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问题时需要特殊照顾。

然而,十分清楚的是,没有任何单独国家,甚至最大的国家,可望继续免受经济疾病和感染的影响。东亚和俄罗斯经济动荡广泛地引起波动。产生与经济全球化的痼疾要求全球范围的治疗,这些治疗必须考虑到所有国家的病痛,而非仅仅依靠似乎无恙的国家所开的处方。

联合国各机构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协助并扶植国家合作以促进公平发展,这种发展可抵御现在折磨我们的经济感染病。国际货币机制在处理最近危机中已证明极为欠缺。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新的金融结构,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急剧改革。其目的应当是实现要求的调整与现有筹资之间的平衡。

我愿提议值得认真考虑的三个行动方面:第一,必须建立“最后贷款者”资金,对付动荡的资本流动问题;第二,必须涉及有效的国际监视手段,在投资者的爆破队进入之前发现问题;第三,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是已提议结构调整的重要要求。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投票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将必须考虑更多的拨款,超过目前所设想的。同时,我们应该当心在国家金融结构现代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前使资本帐户自由化的企图。

必须在互利和共同责任的基础上谋求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应在诸如 7 国集团、77 国集团和 15 国集团的集团之间促进更密切的协商。

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机构必须履行其已宣布的目标,真正地辅助允许稳定增长的透明、基于准则的贸易体系。不得忽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它应得到加强,作为联合国家庭综合审议贸易、财政、技术和投资问题的联络中心。

必须从联合国行政预算拨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活动。以极大期待发起的《联合国发展纲领》似乎失去势头。它的执行不应拖延。

发展不仅是统计数据衡量的经济增长和财政致富的问题,统计数字有时会误导,产生错觉。必须提高并改善全部人类条件。我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诺和责任不应尽量缩小,并让步于虽然重要但不涉及人类福祉的其它问题。当今世界仍有古老的赤贫和饥饿问题是对我们的严重谴责。我呼吁与会国家不被令人兴奋

的新技术的爆炸、有关全球贸易和大量资金的花言巧语欺骗或迷惑,以致穷人、匮乏者、绝望者从我们的议程上消失,被人们遗忘。我们不得忘记,最不发达国家有要求注意的特殊问题。我们必须无情地力争在下个世纪消除这些问题。

77 国集团已提议,在 2000 年召开第三世界首脑会议,纪念新世纪的到来。斯里兰卡支持该建议作为发展中国家制订新时代中自己发展议程的机会。

南盟国家于科伦坡商定,为了辅助经济进步,应给南亚各国人民制定《社会宪章》。它将着重在消除贫困,给予妇女权力,动员青年,促进健康和营养以及保护儿童方面确定实际、基本的准则。

我们必须作出特殊努力,消除影响妇女地位的歧视性、社会和心理观念的作用。南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谴责了对妇女施暴,以及进一步打击妇女尊严的歧视和污辱行径。人们尤其关切武装冲突局势中妇女和女童的困境。

在科伦坡,南盟国家最后确定了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并逼迫她们卖淫的犯罪行为区域公约草案,将在尼泊尔举行的下次首脑会议上签署这个草案。在斯里兰卡国内,我国政府根据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有关结论以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通过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斯里兰卡宪法庄严地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权利。我们已经批准了保证妇女同工同酬和其它利益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各项公约。我们已经加强了反对骚扰妇女和反对从性方面虐待妇女的法律规定。

关于儿童,我国政府最近通过了立法,建立一个直接由我领导的国家儿童保护局。该保护局负责处理儿童就业,儿童被性剥削、教育、保健和武装冲突中儿童苦难等问题。我们已经制订一项“儿童宪章”和国家行动计划,为我国儿童提供安全和保护。我们认识到我国儿童卖淫和淫秽书刊令人遗憾地出现,我们也查出了罪恶的国际联系,这些联系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加强法律和执法机制,以保证那些进行这些邪恶勾当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庇护。

破坏儿童童心的一项特别残酷的罪行是斯里兰卡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假借儿童因幼小而无法理解的事业的名义,强迫地招募儿童作为敢死杀手。

这只是一个被称作泰米尔虎——或称作猛虎组织——的恐怖主义集团卑鄙活动的一个方面。他们企图肢

解斯里兰卡,其目标是在我国建立一个单民族和种族主义实体——这一目标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甚至猛虎组织声称它所代表的那个社区也不能接受这个目标。

我们认为,斯里兰卡存在着民族不满情绪。今年,在我国纪念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我在向全国发表演讲时就坦承这一点。我说,独立的盛典也是进行思考的时刻,是重新燃起希望和热情的时刻。这是享受为成就而欢呼的时刻,也是为失败后果而进行思考的时刻。我说:

“我们还必须老实地检查我们的失败。

我们在建立国家这个重要工作方面失败了。我们走了弯路,在道路上出现了徘徊,而我们的亚洲邻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有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社区组成的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和谐之中。历史将评判这个失败的各项原因。其他人则将分摊并且推卸责任。

“让我们——我们中间那些承担起指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责任的人——联合起来走向未来,抛开为个人蝇头小利或政治利益而斗争的卑鄙私心。今天,我国的需要如此之大,如此之紧急,它只允许展现宽大的胸怀,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这种宽大的胸怀将战胜所有微不足道的利益。”

我国政府坚定地致力于通过政治讨论和平地解决民族不满情绪。我们已经提出一份全面的提议,通过广泛下放政治权力,解决民族不满情绪。我国人民以及我们各个社区多数人都欢迎这些提议。只有猛虎组织选择暴力之路,采取恐怖行动,实现只有它自己支持的目标。然而,只要猛虎组织放弃恐怖主义、放弃建立单独国家的血腥号召,我们仍然向猛虎组织敞开大门,允许它与其他斯里兰卡人一道谈判达成一项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民族问题的办法。

猛虎组织声称是一个“解放组织”,然而当它所声称代表的泰米尔人民不同意猛虎组织的恐怖政治时,它却屠杀了数百泰米尔人民。猛虎组织残酷地谋杀了若干泰米尔族民主党领导人,其中包括议会议员、两名市长、以及若干泰米尔人权活动份子。它自称是“解放组织”,但其行为却否定了这一点,因为它单方面采用暴力,并且不断地拒绝真正地测试其声称——即参加公开、民主和和平地与民磋商进程。

相比之下,在巴勒斯坦,阿拉法特主席追求他所说的“勇者的和平”,他不但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而且深信巴勒斯坦人民为在巴勒斯坦实现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自

愿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在南盟首脑会议上,我们对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若干挫折日益感到关注,这些挫折包括企图改变耶路撒冷管辖范围和边界的非法行为。

在过去几年里,斯里兰卡政府在各国际论坛坚决地主张必须采取集体国际行动,以解决恐怖主义的祸害。我们的理由是,猛虎组织继续破坏任何通过谈判从政治上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努力,象猛虎组织这样残酷的集团在某些国家宽大的庇护政策中找到了支持。这个集团甚至招募只有10岁的儿童、滥杀无辜平民、暗杀人民选出的代表、包括泰米尔族政治和人权领袖、破坏宗教场所,并且在国外国土上暗杀外国政府首脑,但是在许多国家,这个组织却得到允许可以自由活动。这个组织有一个国际网络,进行筹款、贩毒、非法贩运军火、走私非法移民以及最近进行海上和电脑网络上的恐怖主义活动。

三年前,我在对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发表演讲时指出:

“采取一致性的国际行动以反对恐怖主义,迫使恐怖分子放弃暴力并进入和平进程是十分重要的。不幸的是,为此目的采取的有效行动却因为毫无结果的关于恐怖主义性质的哲学性辩论而遭到了失败。”(A/50/PV.35,第8页)

我很高兴地指出,自此之后,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

今年早些时候通过《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爆炸活动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道义胜利。斯里兰卡希望所有国家将尽快采取步骤,执行必要的国内立法,以便实施公约中所作的承诺,保证不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场所,不允许恐怖分子在一国境内筹款以支持在另一国开展的恐怖主义活动。

我们在制订立法时还必须随时警惕保证恐怖分子不能在我们的法律中找到漏洞以回避正在出现的反恐怖主义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我们特别清楚,恐怖集团有能力采取利用掩护组织进行筹款的战略,这些款项最终都落入猛虎组织的战争财库,用于谋杀和残酷虐待我国人民。对恐怖分子从道义和法律上进行制裁是不够的。必须有效地执行法律。只有采取这种协调一致行动,我们才能保证迫使恐怖分子放弃暴力,进入民主进程。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并宣布猛虎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并鼓励我国政府以政治方

式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在此补充说,这是一个斯里兰卡在其各族人民的充分支持下完全有能力并准备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将不会容忍任何外部干涉,我们同时对我们在国外的朋友在解决这个冲突方面给我们的所有支持表示感谢。

如果我在此刻提到缅甸的昂山苏姬夫人,那是因为我个人认识到一个女性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所面对的孤独、痛苦、困难和危险。斯里兰卡人民和缅甸人民以及他们的政府很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朋友。我们两国人民有极其宝贵的共同遗产——即觉者佛陀的永世存在的信息,他教导全世界慈悲、宽容和谅解的含义。这个信息促使我表达一下希望:能以和解和宽容的精神处理缅甸的政治问题。

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能够而且必须发挥促进作用。联合国的存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秘书长把联合国描绘为“人类合作方面的一个崇高试验”。去年被命名为联合国改革年,我们对开始实行的改革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实施感到高兴。其他的改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认识到,由于某些会员国没有及时缴纳其会费,联合国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我们敦促他们全额、无条件按时缴纳会费。

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未能就重组安全理事会以更好地反映联合国会员的普遍性达成协议。安理会应更有代表性,其审议工作应更有透明度和更民主,以便对所有国家关切的问题作出反应,并改变其主要为大国利益服务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并非是完全不准确的。

在这个千年最后几年中,这个世界比通过《联合国宪章》时要复杂得多。本组织必须应付的各种问题的范围和影响大大增加。联合国工作的定向必须能跟上新现实。秘书长的改革方案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为使联合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莫过于会员国对本组织的决定的承诺程度。这些决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本身将取决于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取决于会员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些决定。如果联合国要继续以新的活力步入21世纪,并实现其和平、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各项目标,那就必须使它的所有会员国能够有意义地并在每一个级别参与决策过程。

为此目的,必须将两个重要的改革放在我们的议程上。第一,扩大安全理事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求,以使它能更充分地代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

以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必须在安全理事会中占有常任理事国地位。

第二,必须承认和保障大会在联合国的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联合国大会是人类的最高议会。

今天,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经济全球化正在冲破国家边界,其程度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世界确实将要跨入一个新秩序的门槛,推动这种新秩序的当然不再可能是曾经在如此长的时期中使人类的想象力陷于瘫痪的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考虑。在人类历史中,在我们周围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多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突破让我们陷入平庸和琐碎的世俗的枷锁。当从未被征服的和无法征服的人类精神得以飞腾,而达到其充分的潜力时,我们将实现一个真理和正义的世界,一个我们能够自豪地传给我们各国人民的后代的世界。

我的已故父亲,班达拉奈克总理 1956 年在本大会 11 届会议上发言时说:

“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一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以那个国家的大小、人口、军力或其力量来衡量的。这个组织最有效的自我表达的方式是体现一种道德力量,即人类的集体道义力量和人的纯洁性。在这项任务中,无论强国或弱国都能提供有益的服务。我代表我国向大会保证,就我们而言,只要我们的任何真诚努力能够有助于实现本组织所代表的那些崇高理想,我们就将总是作出最大的努力。”(A/PV.590,第 42 段)

在 42 年之后,在这个大会上讲话时,我想冒昧地说,斯里兰卡继续是本组织的一个忠诚和尽职尽责的成员。我们对它的审议工作的质量和它的方案的实施作出了贡献。我们深刻地致力于《宪章》的原则的实现。我们信任联合国。我们想让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原则的和有效的机构,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不是几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的领地,而是所有国家,特别是穷国和弱国以及无力自卫的国家的保护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加通夫人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发言。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愉快地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阁下,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布莱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当今世界的明确经验是: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更好地一道努力。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共有一个全球环境。我们为发展和繁荣而彼此依赖。区域冲突影响到我们大家。在毒品和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我们各国人民共同遭受痛苦。

我们不再能够把我们在本国边界内取得的成就同我们国界外遇到的情况区分开。我们最近目睹的这种迅速变化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但我们必须共同正视并克服这种恐惧。

如果说我们的财政、贸易、媒介、通讯甚至我们的文化都日益超越国界,那么把我们的政治仍闭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所建立的陈旧框框内,就会很奇怪并可能十分危险。如果挑战具有国际性质,则回应办法也必须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必须发起一个国际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使我们得以进行合作和共同努力的体制实现现代化。

联合国确实取得了成就。情况确实如此。但它也有其失败,这也是事实。联合国曾在野蛮行径四处蔓延时袖手旁观或进行毫无效力的干预。它有时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夸夸其谈。

然而,联合国只不过是其会员国而已。它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念现在同其制定时一样有效。但是,我们必须找出适用这些价值观念的新途径。

因此,我相信联合国,但我也认为它必须现代化,而且必须非常紧迫地采取这一行动。联合国各部门都需要有适当的负责制度,以便使其各项活动都有稳健的筹资办法,更好地管理和更有效的协调。

我们的秘书长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但我们会员国现在应该充分支持他。我们绝不能允许联合国的改革失败。

让我今天强调指出,我们也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这意味着扩大其构成:增设——给予发展中世界以及德国和日本的——新常任席位。仅增设非常任席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妥协。我们谈论这个问题已有五年了。现在到了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但最紧迫的挑战莫过于衰退从目前处于困难之中的那些国家扩散,波及更广泛的世界经济。解决办法不在于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新全面管制的误导尝试或放弃公开贸易。相反,我们都必须承认,国家内部没有适当金融体制和纪律,以及缺乏透明度,迟早要受到市场的惩罚。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制订支持变革进程的新机制:即鼓励提高国际和国内金融交易透明度的规则,改善对金融业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为国际金融机构处理短期流动资金问题提供充足资源,以及给处于困难中的国家制订体制改革方案,该方案必须顾及我们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处理这种复杂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新的和高级别国际合作努力。全球问题需要有全球解决办法。英国作为 8 国集团主席,将在确保对新时代对国际金融结构及其改进方式进行必要审查方面充分发挥其作用。我认为,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优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同 1950 年代不同,不能仅靠几个发达国家。改善金融框架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必须在所有国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国际社会已为自己确定准确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到 2015 年把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目前我们本国的发展努力方针就是铲除贫穷。我曾告诉上届特别会议,我们将扭转我国发展援助额的下滑。我们最近已宣布,把我国的发展预算增加 16 亿英镑,并把我国对非洲保健、教育和饮水项目的支助增加 50%。我们帮助支付了世界卫生组织击退疟疾运动的款项。我们正在努力兑现我们的承诺。

但是,这些发展方案当然只有在条件适宜时才行的通,过去几年浪费了太多的资金。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目前为创造强大发展伙伴关系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必须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我今天呼吁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各部门,给予其发展努力的有效协调最高度优先。否则当今世界的穷人就会遭受损失。

如果我们要铲除贫穷,我们还必须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从全球经济中获益。这意味着,例如,允许它们销售其物品而不对其征收关税。这意味着积极帮助它们从全球化中获益。这也意味着拒绝任何保护主义的虚伪诱惑。

欧洲联盟致力于到2000年对这些国家实现零关税。我要敦促所有发达国家也这样做。

我们还必须减轻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英国已提出《毛里求斯任务书》,以加速向这些陷入债务困境并真正愿意自助摆脱困境的国家提供援助。到2000年,所有有资格的负债沉重的国家都应已踏上减少债务的系统进程,其目标是永远摆脱其债务问题。但我们必须确保做到这一点。再强调一遍,今天这里所代表的各国都必须彼此进行庞大的合作努力。

绝不能牺牲环境而实现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也是对我们提出的挑战。京都的成功可与之相匹敌。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是艰苦的工作,但必须工作。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必须迅速提出可靠的计划,以履行其各项京都承诺。我们英国不久将就我们履行义务的方式发表一份咨询文件。我希望其他国家也挺身而出,并做同样的工作。

世界对联合国抱有很高的期望,把它当作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如果区域组织能够更好地处理区域冲突,联合国就不应介入。但有时我们必须展示集体全球意愿。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果断行事。各项明确的原则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南。让我扼要阐述其中的一些原则。

首先,预防总是比治疗好。在避免冲突方面花费的资源从一旦开火后维持和平的开支相比微不足道。联合国正在这方面加强其能力,但它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为此英国再次保证发挥其作用。

第二,如必须派遣蓝盔人员,就应该赋予他们明确和可实现的任务。在波斯尼亚,维持和平人员曾介入实战冲突,并被告知捍卫安全区,但没有给他们这样做的手段,这种情况绝不能再重演。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需要有进入和撤出的途径。他们必须有从事其工作的手段,以及明确和有效的指挥。

第三,联合国必须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并作出回应。快速行动可以防止冲突升级,支持脆弱的停战并拯救生命。我们英国也在这方面努力发挥其作用。根据我国

的《战略防御审查报告》整编英国武装力量,使我们为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作贡献的能力正在得到改造:即增加和改进迅速反应部队、增强战略运输力量并改善后勤能力。

今天,我可以宣布,在6个月内,我们将同联合国达成一份具体的协定,确保联合国能在需要时可迅速利用我国可提供的资源——这是一个常任理事国同联合国达成的第一份这样的协定。

第四,维持和平必须从一开始就伴之以缔造和平的工作,以恢复正义、民族机构、繁荣和人权。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冲突的各种症状,而不仅仅是冲突的根源。它必须同联合国其他部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作,才能有长远的影响。我将再请秘书长向我们提出新的建议,处理冲突的后果和根源,使这成为现实。

这些冲突许多还在。几乎没有问题比恢复大湖区和平更加迫切。中东和平进程仍然明显陷于僵局。我们已在北爱尔兰取得进展,世界社会这方面对我们的支持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极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感谢这一支持,而且我希望世界将继续提供这一支持。我认为,现在也是在中东进一步向前迈进的时候了。我们英国人也愿意发挥我们的作用,实现这一进展。

但是我要着重谈另一个迫切关心的领域:科索沃。令人难以置信,米洛舍维奇总统的治安部队再次不顾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残暴镇压那些他们自称为同胞公民的人。当然我们承认,所谓科索沃解放军的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行为为造成目前可怕的局势也有责任。但是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推行焦土战术和强迫造成数以万计的难民的行径的理由。

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在这一局势中有一些明确的责任。首先,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对于不守承诺——假心假意地保证而又不履行——的行为已经失去耐心。继续军事镇压必将导致一种新的反响。第二,我们必须让双方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谈判,现实地认识到怎么是可能的,并指出取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道路。第三,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必须满足科索沃难民眼下迫切的人道主义需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防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随着冬季的到来即将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建议通过一份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要求立即实行停火,要求立即停止践踏科索沃居民的权利。这项决议应在本星期通过,米洛舍维奇总统如果无视这样一项决议,后果自己承担。

国际社会在伊拉克面临另一场严重的挑战。安全理事会一致要求伊拉克恢复同联合国合作,而且科菲·安南今年早期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问题,勇敢地同伊拉克领导人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定。这项协定必须得到遵守,而且我们将发挥自己的作用,确保协定得到尊重。

最后,我们面临两种世界性祸害,它们能够破坏我们的机构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毒品和恐怖主义。我们都知道,毒品与犯罪和许多国家不稳定之间有日益密切的联系。毒品对所有接触毒品的人——种植者、走私者、犯毒者和用毒者,都产生可恶的腐败作用。正如我们所知,我们必须处理毒品问题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我们又看不到我们必须跨越的大山有多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这是一场我们有可能输掉的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赢。英国将在国际一级,对我们的优先工作再花 2 亿英镑,但是我们的集体努力需要一个更加有力的重点。

研究这一问题的组织不少,事实上可能太多。但是我们结果极小,那就是要割断供给线,消灭非法作物种植,以及阻断犯毒者的利润。我们有一个新的工具: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公约。许多国家仍为犯罪所得提供庇护所。我们必须一起要求这些国家清除贩毒者和他们的赃钱——怎么痛就怎么打击毒枭。这份公约将提供这样做的切实手段,但是谈判工作在拖后腿。让我们给自己规定,至迟在新千年开始前完成谈判。

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也有了新的迫切感。去年恐怖袭击的全球名单包括卢克苏尔、达累斯萨拉姆、内罗毕、奥马和其他许多地方。每一次都提醒人们,恐怖主义这种极端野蛮和卑鄙的罪行。每一次都提醒我们,恐怖主义分子不尊重国界。每一次都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不能有藏身之地,不能给他们募捐的机会,我们把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决心不能松懈。这同样适用于无国界恐怖主义的新现象,以及恐怖主义的各种更加熟悉的形式。

作为第一步,所有国家都必须签署十一项国际公约,确保恐怖主义分子没有藏身之地。我们自己刚在英国通过新的立法,确保我们能够解决针对第三国的恐怖主义阴谋。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此。只有我们大家都投入这场斗争,我们才能希望打败恐怖主义。因此,我欢迎法国总统最近倡议在国际上展开努力,解决为恐怖主义募捐的问题。作为 8 国集团的主席,今天我在此提出,今年秋季在伦敦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不让恐怖主义分子

得到这种方式的支持。根据国际协定采取有效的新措施,能够带来真正的结果。

我在大会发言中谈了许多问题,但我要讲的主要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这个新世纪的到来,我们面临多种新的挑战。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成功地应付这些挑战的唯一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应付。我们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和现代机构来处理我们的政治问题和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联合国体系前所未有地振作起来。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国际机构振兴和现代化,以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危机。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政治意愿和一种迫切感。我们现代世界的问题太迫切,后果太直接,影响太深远,我们再不能犹豫或者回避。我们已经得到警告,要采取行动,有目的、有方向地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些挑战,否则就要付出代价。而现在就是这样做——就是响应这一警告的时候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刚才的讲话。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会议员、首相托尼·布莱尔阁下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下午 1 时 50 分散会。